

成恩元 著

敦煌琴经笺证

蜀蓉棋艺出版社

敦 煌 碑 经 箋 证

成思元 著

易善堂書局

责任编辑：白小川

封面设计：陈克刚

校 对：孙荣英

敦煌摹经笺证

成恩元著

西華書局出版社 出版
成都青龙巷 9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5 印张 1 插页 25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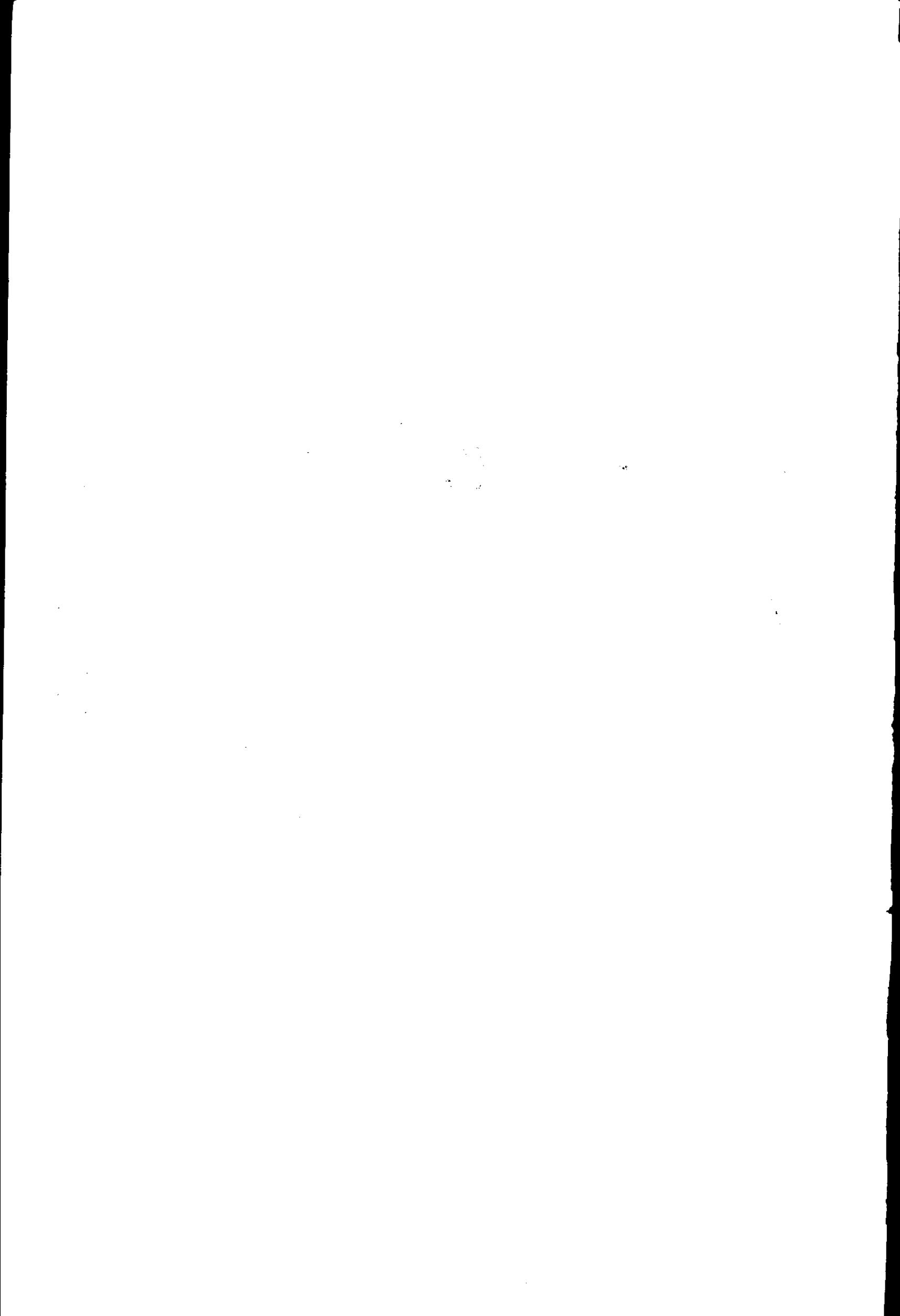
ISBN7-80548-211-X/G·212 定价：（复膜） 5.80元

目 录

一、代序	(1)
敦煌写本《碁经》初探	
——围棋经典著作的新发现.....	(3)
(一) 我国历代对最古棋经的不同认识.....	(4)
(二) 敦煌写本《碁经》发现的经过.....	(8)
(三) 敦煌写本《碁经》的时代.....	(13)
(四) 敦煌写本《碁经》的十大贡献.....	(28)
(五) 简注本敦煌《碁经》.....	(33)
二、敦煌写本《碁经》卷子图版	(53)
三、影钞标点本敦煌《碁经》	(57)
四、敦煌写本《碁经》笺注论证	(65)
□□篇第二.....	(67)
诱征篇第二.....	(91)
势用篇第三.....	(119)
像名篇第四.....	(158)
释图势篇第五.....	(185)
基制篇第六.....	(189)
部表篇第七.....	(200)
基病法.....	(212)
基法.....	(230)
梁武帝《碁评要略》.....	(244)
碁经一卷及藏文题记.....	(261)
五、敦煌写本《碁经》与张拟《棋经》的比较研究	(267)

六、白文点校本敦煌《摹经》	(303)	
七、附录	(315)	
(一) 翟理斯 (L.Giles) 《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详目》英文提要	(316)	
(二) 敦煌《摹经》字数统计表	(317)	
(三) 敦煌写本《摹经》中所见的别体字	(319)	
(四) 主要参考书、篇目录	(328)	
※	※	※
作者小传	(266)	
作者对本书的简评	(302)	

一、代序



敦煌写本《碁经》初探

——围棋经典著作的新发现

〔敦煌写本《碁经》的发现，是中国围棋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重大收获。本文（以下简称《初探》）写于1962—1963年间，其中大部分曾在上海《围棋》月刊1964年1—7期上连续刊载过。1986年又将其中第五部分《简注本敦煌〈碁经〉》发表于《中国围棋》一书中，但全文仍未载完。此次写《敦煌写本〈碁经〉笺证》（以下简称《笺证》），本应有《序》，因念《初探》一文中，已将敦煌《碁经》发现的经过，以及最初六十年间的遭遇情况，作了较详的介绍。关于《碁经》卷子的时代问题，英国著名敦煌学者翟理斯（L.Giles）订为公元900年，即晚唐时期；中国科学院刘铭恕先生亦同意此说，其实均误。实际上它应当是北周时期的产物。我在文中第三部分，从目录学、避讳学等角度作了详细的考证。为了节约篇幅，这些细节都不准备在本书中重复。因特将全文录出，以代本书《序言》。由于文章发表于二十四年前，其中有些论点，在写《笺证》时，已有所更变。这次作了一些修订；但基本上仍保持了原文本来面目。如原文所说《碁经》十大贡献，是当时的粗略说法。读者从《笺证》中可以看出它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此。还有很多宝贵的内涵，等待着我们继续进行更深入的发掘与探讨。〕

1988年3月18日

(一) 我国历代对最古棋经的不同认识

为了全面地探讨敦煌写本《碁经》，首先，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我国现存〔指当时，1964年的情况—本文作者1988年附注〕最古的棋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清楚地确定敦煌本《碁经》在我国围棋发展史上所应占的地位以及它今后将发生的作用和贡献。

谈到棋经，就使我们想到中国围棋在世界棋类发展史上所占有的辉煌地位和贡献。远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有关围棋的记载。到了六朝时期，专业性的书籍开始出现。不独有棋谱和棋势等著作，而且理论性的专著也不断出现，形成了我国围棋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但可惜的是唐朝以前的这批丰富遗产，由于种种原因，除却少数短文以外，大半都先后失传了。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国现存最古的棋经究竟是什么？所得答案，大致是这样的：唐或唐以前是曾经有过棋经的，正如上文所述，已经失传了。现存最古的棋经应当是赫赫有名的宋朝张拟的《棋经十三篇》。

这一答案并不是我“杜撰”的，这是多年来，甚至于到最近仍为大家所公认的答案。为了说明问题，不妨选引几段诸家关于最古棋经的评介，时间上从明朝谈起。

1. 《永乐大典》：原书虽已无法看到，但从清代《四库全书》中可以间接知道一些。据《四库全书提要》所录，明《永乐大典》中，所辑录的棋书，只有两种：其一即《元元（玄玄）棋经》。^[1]这是明朝所存最早的棋书。因为其中附有张拟《棋经》，因而也就成了明朝所存最古的棋经。同时，也是当时所存唯一的一种棋经。此外，在明人其他棋书中，如《石室仙机》《秋仙遗谱》等也附有张拟《棋经》，不过版本时代，则比较更

晚了。

2. 《四库全书》——在“总目”中著录了棋书二种，“艺术类存目”中著录了四种⁽²⁾。这六种中仍以《元元（玄玄）棋经》为最古。

3. 邓元德《前代弈谱目录》——《棋经十三篇》条注：“德案：元晏天章、严德甫辑《元元集》，冠十三篇于卷首，此《棋经》刻本流传之最古者。”⁽³⁾案：邓著发表于清光绪十年（1884），这可以代表清代大多数棋人的看法。

4. 杨荫深《中国游艺研究》——第三章弈棋条称：“围棋的书谱……今传于世者，以宋刘仲甫《棋诀》为最古……又有张拟《棋经》一卷，凡十三篇；两书皆为弈家所称许，奉为圭臬的。”⁽⁴⁾杨著发表于1946年，可以代表解放前一般人对张拟《棋经》的看法。

5. 中华书局《辞海》（1961年试行本及1963年试排本——“棋谱”条称：“今所存惟有南宋棋待诏李逸民所编《忘忧清乐集》及元代晏天章、严德甫所辑《玄玄集》为最古”。⁽⁵⁾ 试行本及试排本都选录有《棋经十三篇》。试行本介绍了围棋重要著作凡五种，列张拟《棋经十三篇》于首。可见撰者也以张著为现存最古的，也是唯一的围棋《棋经》。案《辞海》是中华书局最近若干年来，邀请了全国许多专家执笔，经过了若干次修改而成的一部质量较高的著述。因此，它可以代表截至最近（1963年）为止国内棋人对张拟《棋经》一书的看法。〔《辞海》已由上海辞书出版社于1979年9月正式出版。“棋谱”条内容基本上仍如上述。另列有《棋经十三篇》一条，而无《敦煌写本墓经》条。可见截至1979年止，在一些学人以及更多的群众心目中仍不知有敦煌写本《墓经》，而仍停留在以张拟《棋经十三篇》为最古《棋经》的水平上。——本文作者1988年补注。〕

事实也确是如此，过去五、六百年以来，（或者更早至宋

代），张拟《棋经十三篇》在围棋界确实发生着“奉为圭臬”的作用。因此，弄清楚张拟《棋经十三篇》的内容概要，成书原委，流传情况，也就成了我们所必须探讨的对象之一。

张拟《棋经十三篇》究竟是怎样的一部书呢？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只知道张拟是北宋皇祐（1049——1053）中的一个学士。其他生平事迹，已不可考。通行本《棋经十三篇》大半都把他的名字写作“擬”，也有写作“儻”的。近人余嘉锡则主张张儻即张靖。^[6]但所持理由，似乎还不十分充足。今据晏天章《玄玄集》及黄丕烈所获宋本《忘忧清乐集》仍作张拟。后人偶或书作张“儻”，也不算大误，因“儻”为“拟”的别体字。儻、拟二字，古通用。（我另有释文，此处从略）张拟在皇祐中把围棋的战略战术原则，以及有关围棋的其他规则、辞汇、释文等，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整理，写成一部名为《棋经》的书。因为他采用的形式仿自《孙子兵法》十三篇，因而通称《棋经十三篇》。从北宋起，一直到今天，张拟的《棋经》受到了历代弈家的重视，成为我国围棋著述中流行最广，影响最深，而且也是存世唯一的一部理论性的经典著作。

张拟《棋经》有时又被人称作《玄玄棋经》。这是因为元朝至正九年（1349）晏天章、严德甫编纂《玄玄集》时，首列《棋经十三篇》而得名的。严格说来，以《玄玄棋经》称《棋经十三篇》是不妥当的。它只能说是明清以来大家对张拟《棋经》的一种俗称，是由于《玄玄集》的影响得到的一种浑名。元版晏著，今日已极难得，但它的原名，肯定不是《玄玄棋经》，而是《玄玄集》。这一点可以从原书虞集序言中得到证明。^[7]大约从明初姚广孝等辑《永乐大典》时起，已改称《玄玄棋经》。今天国内所存的本子，包括诸家所见所闻，都是明清重刻本。四川成都图书馆所藏元版《玄玄棋经》，实际上仍系明刻本。此书封面有黄色扉页一纸，刻“坐隐斋先生自订棋谱全集”十一字。^[8]

坐隐斋先生系明海阳汪昌朝号，他与李卓吾、王穉登、屠隆等同时。此书当系汪氏所刻棋谱全集中的一种。时代大约在万历间（三十七年后）。

从晏天章、严德甫的《玄玄集》刊行以后一直到清初，前后三百四十一年中，一般人所看到的最古的，也是唯一的棋经专著，即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它的版本则是元刊或明翻刻版《玄玄集》中的刻本。这可以说是《玄玄集》棋经独步时期。

据钱遵王（曾）《读书敏求记》载：他曾在康熙二十九年（庚午），〔9〕获得宋刻《李逸民棋谱》。案：即李逸民《忘忧清乐集》，其中当附有张拟《棋经十三篇》。这是第一次发现宋刻本《棋经》，确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快事。遵王自称“得之意蕊舒放，欣喜竟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遵王所藏刻本，仅限于昙花一现，其后旋即下落不明。而且在遵王注文中，也不曾提及附有《棋经》事。细揣文意，知遵王所得，当系残本。因此，从遵王发现宋本《忘忧清乐集》后至嘉庆间再度发现为止，在这一百七十二年中，一般人所看到的《棋经十三篇》仍以明清翻刻本为主。有机会看到宋本《棋经十三篇》的人是很少的。

到了嘉庆七年（1802），黄丕烈从阜阳顾氏处得到宋刻李逸民《忘忧清乐集》。其后徐乃昌刻入《随庵徐氏丛书续编》。从此，人们才广泛地看到了张拟《棋经十三篇》的南宋刻本，较之于至正本，又提早了296年。

从北宋皇祐间到最近为止，910年来，张拟《棋经十三篇》是我国公认的存世最古的棋经。它，光芒四射，独步一时。较欧洲最古的棋类经典著作，还要早250余年！但在敦煌本《暮经》发现之后，却出现了新情况。我国现存最古棋经的大旗，今后将由敦煌本《暮经》揭举起来。但从围棋研究的总的方面来说，新旧棋经，都各有其优点，各有其重要性。相信由于这一重要资料的发现，今后不独在围棋发展史上，新增辟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而

且在围棋理论方面，新旧棋经对照，也一定会多所发明，多所贡献的。同时，也给今后编写新的棋经，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二）敦煌写本《碁经》发现的经过

敦煌本《碁经》，是指在甘肃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一种手写卷子。远在60多年前，敦煌石窟遗书已被人发现。但敦煌本《碁经》的发现，却推迟了近30年。至于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正式介绍原文和世人见面，在此之前，还没有人写过专著。因此，敦煌写本《碁经》的再度诞生，当从此始。〔按：由于本文过长，《围棋》月刊的篇幅有限，编辑把敦煌《碁经》的“原文”部分不得已而删去了。因此，当时“原文”也并未与“世人见面”。又过了20年，才于1985年在《中国围棋》中第一次发表了敦煌本《碁经》原文——本文作者1987年附注。〕

敦煌石室遗书是在1899年^[10]由王道士圆篆所发现的。但这批遗书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有什么重大的价值，王道士是不知道的。以后经过英、法、日、俄帝国主义分子的陆续劫掠，《碁经》这一卷子，最后便落在英籍匈人斯坦因(A·Stein)的手里。斯坦因曾两次来敦煌盗劫。第一次在1907年，盗去了写、印本经卷、图书等6520多卷。第二次在1914年，又盗去了写经570多卷。至于《碁经》这一卷子，究竟是在第一次被盗去，抑或在第二次？则不得而知。在它被盗劫以后，很快地被打入了“大英博物馆”的冷宫中昏睡了50多年。

1962年是敦煌学发展史上值得注意的一年。在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完成了一件重要著述——《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由于种种原因，当时我没有看到这部书。又过了一段时期，在前年的冬季，任二北先生告诉我：在敦煌经卷目录中有一段有关《碁经》的记载。这一消息引起了我的极大注意，很快地找到了“总

目”，在斯坦因的劫经录中5574号下，果然写有《摹经》一卷，而且后面还附有经卷中的七篇详目。我意识到这应当是比流传九百多年的张拟《棋经十三篇》更早的一种棋经。但又想到敦煌石室遗书中，也有宋初的经卷。会不会是张拟《棋经》的早期本子，也还不敢十分肯定。

为了得到《摹经》的原文，前后费了很大的劲。终于在上年（1963）四月下旬看到了科学院翻摄的《英伦敦博物院藏敦煌经卷》“斯5574”号显微底片。我用一个倍数不大的放大镜，翻看了底片上的全文。肯定了这一写本确实在北宋张拟《棋经》成书前的作品。它是失传了900多年的一种更早的《摹经》。

在发现《摹经》之后，紧接着所产生的问题是：这一《摹经》，过去有没有人介绍过或著录过？如果没有，为什么？如果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广大的群众又为什么一直不知道？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我所得到的结论，大致是这样的：从敦煌石室遗书发现以后，在前30多年中，《摹经》一书，始终没有被公开介绍过；后20多年中，虽然曾经有人提到过书名或简略叙述过，但也没有引起有关的专家、著者和广大群众的注意。至于为什么如此，原因不外下列几点：

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分子对敦煌遗书采取了垄断幽禁政策，因而造成了多年人为埋没的恶果。这里有一点需要加以说明：劫走的敦煌遗书，主要分存于两处：一在巴黎，一在伦敦。《摹经》卷子是属于在伦敦的那部分的。在早期研究中，从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一直到刘半农，他们所接触和探讨的对象，主要的是伯希和（P·Pelliot）在巴黎所藏的劫经。至于伦敦劫经，他们几乎没有，或者很少接触过。最多也不过间接地看到一些极有限的简目。《摹经》这一卷子，他们是始终没有机会看到的。

关于伦敦部分，从1899年敦煌遗书发现起，到1907年斯坦因第一次盗劫止，在这段时间内，《摹经》不可能出现的原委，已

如上述，这里不再重复。在这以后，从1907年起，斯坦因把大批遗书劫归大英博物馆后，即实行幽禁的办法，特别是当这些外国人看到我国敦煌学逐渐发展的时候，更变本加厉地设法刁难，不让我国学者看到全部实物。正如王重民先生在《敦煌文物被盗记》一文中所说的：“敦煌学……招来了帝国主义支那通们的嫉妬，实行幽闭敦煌经卷政策，〔企图〕把这个学术研究运动绞死。”〔11〕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我国最早注意整理伦敦劫经的第一个学者是罗福芸。1922年他曾收集整理了一篇《伦敦博物院敦煌书目》〔12〕发表于前北大《国学季刊》创刊号上。文中所收经卷目录共326种，不及斯坦因劫经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一部分还是辗转从法人沙畹手里得到的。不幸的是在这份目录中，恰巧没有《摹经》这一卷子。

又过了12年，王重民先生为前北京图书馆摄制敦煌古籍影片曾到达伦敦，前后虽曾看过一些卷子，但数量很有限。王先生所写的题记一直没有印成专辑发表。〔13〕散见于报刊上的部分题记中，也没有提到《摹经》。至于“从来没有发表过”的那部分中，有无《摹经》则不得而知。

1933年原清华大学历史系张荫麟教授在伦敦“偶过”大英博物馆，在写本陈列室中“得覩敦煌写本十数种”，后张氏写成《不列颠博物院藏中国写本瞥记》一文，以“素痴”笔名发表于《国闻周报》。〔14〕在这“十数种”写本中，张氏有幸看到了《摹经》写本。〔15〕除作了简要评述外，还全录了经文卷末所附录的《梁武帝〈摹评要略〉》，张氏全文如下〔原文没有断句，标点系笔者所加。〕：

《摹经》一卷 (S 5574)，陈列标记云：“凡七章，时代约900。”此卷完好无缺，惟书法甚劣，不著撰人。《摹经》为名之唐宋正史艺文志均不见著录。言围棋战术之书见存者，以此为最古矣。卷末附有梁武帝《摹评要略》。按《旧唐书·经籍志》

有梁武帝《摹评》一卷，新书仍旧著录，宋以后久佚。此附录，盖《摹评》之节抄。文词不甚亨通，必出俗手。然摹法书之内容可考者，以此为最古。全录之如下：……（下略）

这是国人对敦煌写本《摹经》最早的记载。张先生扼要评介了《摹经》情况，并抄录了梁武帝《摹评要略》，这是难能可贵的。张先生对敦煌《摹经》的发现，得之于两个“偶然”。第一，他当时是“途过伦敦，作旬日淹〔留〕”，正值原北平图书馆委托浦江清与大英博物馆接洽摄影敦煌佛经失败之时，因而张亦放弃再访该馆有所请求的意愿，^[16]后因“偶过该馆”，才在已陈列出的展品中看到这一经卷。第二，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经卷，数以千计。这些经卷，“以时更换”。全部经卷，须多年才得轮流更换一遍。因此，前张先生游者不得即见，后张先生游者，也不得即见。张先生以“偶过”而又“偶遇”，竟得获见此一珍品。这一或然率与中国盘奖之难，相差无几，亦云幸矣。然这一幸遇，上距1899年敦煌遗书发现之日，已达34年，他的文章发表于1934年，世人获知此一消息时，已是敦煌遗书发现之后的第35个年头，按中国人“三十年为一世”的传统说法计，已是隔世的事了。

张荫麟先生的报导虽然发表了，可惜还有几点遗憾的事：一、张先生的重点似乎是放在附录中的梁武帝《摹评要略》上，而没有以同样的重视态度对待《摹经》。这由他“全录”了《摹评要略》原文可知。对于《摹经》，他只概括地说了一句话：“言围棋战术之书”，连“七篇”的篇名都没有提，具体内容就更无一语所及了。因此，世人对于这一《摹经》的具体内容，仍然一无所知。对于《摹经》的时代，他没有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只抄录了翟理斯的原文“约900”几个字，似乎是同意了翟说，这是错误的（说详后）。张先生说“书法甚劣”。《摹经》书法与经生中善书者比，固然不及，但也不能说“过劣”。张先生又

指责梁武帝《摹评要略》的抄录者，“文词不甚亨通，必出俗手”。这有点冤枉。此语若赠给《摹经》及《摹病法》两篇，似还合适。若以之批判《摹评要略》，不独事实不符，逻辑上也讲不通。今观《摹评要略》所作提要，全篇文通字顺，并无“不亨通”处；退一步说，即使有，那也应由梁武帝承担，不应横加在抄写者的头上。

当然，张荫麟先生报导敦煌《摹经》后没有引起广大围棋界人士注意的原因，张先生是没有多大责任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围棋界的人们，绝大多数棋手从来不读这类目录性的、学究性的文章。而从事目录学，或一般敦煌学的人，则又很少懂得或注意围棋这一领域，因而在当时及这以后很长的时期内，也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1936——1937年间，向达先生在伦敦翻阅敦煌经卷，看到了将近五百卷。以后，向先生把这次所收集的资料，写成了《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发表于1939年的《国学季刊》上。⁽¹⁷⁾1957年又收入《唐代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在向先生的这一目录中，列有《摹经159》字样，虽然仅有五字，较张荫麟先生的报导更为简略，但这是敦煌写本《摹经》在中国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敦煌文献目录中的第一次出现，它上距1899年敦煌遗书的发现已整整过去41个年头了。

以后，可能有极少数的人看到了全部伦敦所藏的斯坦因劫经，但对《摹经》这一资料，也没有写过任何更详尽的报导。例如在1949——1957年期间，王庆菽同志曾翻阅了这份劫经的全部卷子，但王先生所影印的也只有262卷。主要内容仍限于变文和小说方面，至于所拍摄的“一部分古籍及其他资料”⁽¹⁸⁾中，有无《摹经》不得而知。

从1939年起，又过了15年，1954年大英博物馆公开出售全部斯坦因劫经显微胶片，这一年应当说是《摹经》内容正式公开的